

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合一。沧海桑田的巨变和移民社会，构成了香山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相得益彰的生活环境。香山人在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学会了思考和创造，懂得了博爱和包容。一方面，他们善于适应环境和灵活变通，处事从容，稳中求进，表现出一种务实守信和客观公正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网络中，表现出和睦相处、守望相助、重礼尚义的人文精神，真正做到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就是香山文化在当代中山社会的传承与创新。

三、知行合一

人不能离自然与人类而孤立，当他顺着意志谋生时，势必与自然和他人发生关系。这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一种人与文化的关系。代代相传和不断发展的香山文化，对于年幼的郑观应来说，就是他的根本。有的学者就指出：郑观应人生之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既面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又固守乡土传统、乡土文化的澳门、香山地方的社区环境中渡过了青年时代，并完成了早期教育。当地的经商传统使郑观应刚及成年就早早走上买办商人的道路，而当地的文化传统则已潜移默化地深植于他的思想深处，而影响着后来的思想发展道路。收在《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的第一首诗《侠客行》，应是郑观应最早的诗作，既透露出作者不甘平平淡淡度过一生的高远心志，也显示出作者是深受故乡乡土文化的影响。”^①也就是说，香山文化的人文特质和香山人的精神品格，在郑观应身上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影响的痕迹。

首先，香山人的经商传统，与外商打交道的知识、经验和才干，影响了郑观应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

香山人在中外贸易的过程中，较早地得到了锻炼。一批精通中外贸易业务和

^①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11·12页。

外国语言的买办商人，在近代中国开埠通商后应运而生。^① 郑观应的家族和他的亲朋好友中做买办的就有不少人。他的父亲曾一度经商并做过买办。他叔父郑廷江（秀山）是上海新德洋行的买办。他的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香山雍陌村的郑氏家族子弟在郑文瑞的安排下大都弃文从商，甚至直接成为洋行的买办。郑观应的胞弟郑翼之在英商太古洋行做买办。郑观应的同宗哥哥郑济东和徐润都在上海宝顺洋行学艺。受香山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等的影响，整个 19 世纪，香山唐氏家族、徐氏家族、莫氏家族和郑氏家族，几乎祖孙三代成为洋行的雇员。曾经不太引人注意的香山县，在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后，几乎成了中国“买办的故乡”。

香山重商传统和长期对外贸易形成的家族式商业关系网络和人脉，是郑观应习文重商意识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郑氏家族与香山买办莫仕扬家族有密切的联系。郑氏族人和莫氏族人长期在英商太古洋行共事，彼此提携，相互扶持，就是例证。郑氏家族和有名望的买办唐廷枢家族是姻亲，与另一买办商人徐润家族是“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郑观应晚年有诗《赠徐雨之观察》，诗中“三番共事将卅载，两代相交近百年”，^② 说的就是郑氏家族与徐润家族的历史渊源和相互关系。1892 年秋唐廷枢逝世后，郑观应明知盛宣怀与唐廷枢关系不甚融洽，他本人与唐廷枢、徐润等同乡也有见解相左之处，如在轮船招商局的内部管理、人事制度和经营运作等方面，对唐廷枢、徐润的言行就颇有微词，^③ 但在至盛宣怀的信

① 作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口，中外商品的中转站的香山澳门，较早地具有了外向型商品经济的特征，十分注重现实利益，讲求市场效应。先后有欧、亚、非、美等洲约 20 多个古代国家的商人来过澳门。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述：“他们（广东人）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增加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一个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到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在阿妈湾内”（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40 页）。还在 1564 年，广东御史庞尚鹏在《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中就指出：“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康熙帝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后，由澳门至马民拉及巴达维亚之船只，出入频繁，澳门关税达二万两云。澳门市贸既咸盛，人口之日增，自在意中。”（转引黄启臣：《澳门通史》，第 175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在《酌陈澳门等事疏》中称：“广东香山澳向有西洋人来贸易，居住纳租逾二百年，今户日繁，总计男妇三千五百六十七名，大小洋船近年从外国造船回澳，共有二十五艘，此后船只日增。”而澳门生活资料的供应几乎全赖香山县，清政府规定“粮食计口而援，每儿日放一关；其一切用物皆藉检查留难。计（香山）县与澳（门）人口数万，断绝往来生业，生食致困，愁苦难言。”可见澳门与香山的商贸往来自 16 世纪后期以来一直不曾有过间断。香山县正是有了澳门这一个对外贸易的基地，而有了外贸和商业方面的训练，以及中外文化交流。

② 《郑观应集》（下），第 1323 页。

③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九章。

函中仍对唐廷枢心存敬意，并吁请盛宣怀重金抚恤唐廷枢遗属。他写道：“……知唐景翁于八月十七日作古，闻信之下，悲悼久之。盖此公一生精力尽消磨于商务、洋务之中，数十年来备尝艰苦，凡事不因仇怨，顾全大局，力图整顿，洵为吾粤中办洋务之特出者。弟与之谊属至亲，诸多叻爱，相依最久，亦相知最深。见其身前一切多为亲友所累，外强中干，有名无实，其身后谅可想见。阁下情殷念旧，当亦为之感慨也。伏忆景翁前在上海与公等创办招商局务，颇费心力，同事有年，故人情重，无待鄙言赘及矣。”^①这也表明香山买办内部虽然有意见和性格向左的地方，但并不影响他们对外的团结一致，相互支持。乡土情谊和血缘业缘关系，使郑观应始终自觉地与香山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努力维持同乡的利益和名誉。

郑观应弃文从商，入洋行做买办，显然与香山这一独特的商业文化环境的影响有关。在《救时揭要》序文中，郑观应曾感慨地说：“仆家贫日及贾，负米娱亲，普济虽有怀，恨乏点金之术；显扬仍未遂，徒深投笔之心。唯是庭训夙承，不敢自弃，性耽铅鋈，大意粗知。于是不揣固陋，聊效芹曝。研性理则辑道言精义，论感应则集志果诸书，窃冀广推，妄灾梨枣；又复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更伸鄙臆，撰成是编。或者牛溲马勃，亦备良医之用；方言俚语，不为大雅所遗，于末俗人心，或可少裨万一。是则区区之心所深慰也已。”^②在《易言》序文中再次自我表白：“余质性鲁钝，鲜能记诵。长而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而沪上为江海通津，南北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与之周旋晋接。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金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諏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往余于同治庚午、辛未间，端居多暇，涉猎简编，偶有所见，随笔札记。内之积感存于心，外之眷怀于大局。”^③甚至在《盛世危言·自序》中，他又旧话重提：“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④从这三个不同时期的序文中，我们不难看出香山文化中的重商传统和务实进取的精神，

① 《郑观应至盛宣怀函》。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5页。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3页。

④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233—234页。

在郑观应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商战思想的形成和富强救国主张的提出，也同样受到香山独特的商业文化环境的影响。^①

其次，香山又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移民社会和著名的侨乡，香山人的开放创新和兼容并包的精神，同样影响了郑观应的思想和行动。鸦片战争前，香山就有不少人出洋谋生。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新旧金山的相继发现，吸引了大批香山人出外寻求发展。^②他们到了国外，凭着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精神，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有的甚至真的发家致富了。这些海外香山人回来时，不仅带回了数量可观的金钱，而且也捎回了在海外所见所闻的各种信息。曾做过广州市长和中华民国驻墨西哥、巴西大使的程天固（1889—1974）在回忆录中就认为，香山因不少人出洋谋生致富回家后，其物质上的富足和精神上的昂扬，影响了家乡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说：“当时本乡出洋谋生的人很多，每家墙壁上都贴上一条什么‘金山发达’、‘大吕宋顺利’、‘小吕宋好景’、‘南洋发财’等好意头的标语，见到这种标语，便可知道这家有人往该地谋生，也就是说，这家的子弟已有很好的出路了。如果他日赚了一笔钱回家，这是家中目为荣幸的事，并且外乡人最钦慕的事，尤以从美国回来的，没有一个不被人认为满载而归的。乡中有谚语说‘金山客没有一千都有八百’，故凡乡中之择婿者或女子之求出嫁者，都以出洋回乡的人为追求的对象，其羡慕之情形可见一斑。……如能有机会出洋去做的话，是最有希望的，这几乎是我乡当时的一般观念，又为我乡中出洋谋生人数之多的一个缘故。”^③大规模的跨国移民，既扩大了香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又确实有效地改变了香山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原来贫穷落后的香山，因为有了为数众多的华侨和买办商人，整个社会也就渐渐有了向上的生气。^④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香山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移民和不断开发的历史。香山的社会，因此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移民社会。香山县从大海中的

① 参见胡波：《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阅读中山商业文化》，胡波主编：《人文香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参见胡波：《试析香山人移居海外的动因（1911年前）》，胡波著：《思想人物与历史文化》；韦庆远：《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澳门史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叶显恩：《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徽州与粤海论稿》。

③ 程天固：《程天固回忆录》，香港龙门书店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2—13页。

④ 《中山市志》；中山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珠海市志》。

一个小岛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上的上等县，除了大自然的伟大作用外，更重要的恐怕与香山历史上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围垦造田，发展农业生产有关。^① 鸦片战争以后，沿海通商口岸相继开辟，香山人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又不断地向香港、广州、厦门、上海、汉口、天津等城市迁移，并很快地在当地渐露头角。在香山人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其言行越来越趋向于务实灵活、团结进取。《上海广肇公所缘起》一文中就指出：“盖闻天下郡县之积也，郡县一里乡之积也。通力合作，宋望相助，是以统乡里、郡县而天下治也。自井田废而牵车服贾迁于远方者日多。则去其乡而与非同乡之人居，情谊势不相属，因萃同乡里郡县之人，聚处异地仍如故乡，于是乎有会馆之设，亦先王任恤许之义焉。沪渎通商甲天下，我粤广肇两郡，或仕宦，或商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故有会馆之设）”。^② 上海广肇公所的创立，以及其职能的体现，就反映了以香山买办为代表的香山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③

香山这种开放包容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移民社会，无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郑观应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他年轻时弃文从商，到上海洋行谋生同时，并对西方文化始终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就是例证。郑观应完成了早期儒家教育后，在其父的安排下，也像众多的香山人一样到沿海通商口岸去谋求发展，即他自己所说的“年十七，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学贾”。后来在自述中又再次强调弃文从商和自学英文，进入洋行做买办的特殊经历：“余幼承庭训，年十七奉父命赴沪学商务，欲入英文书馆肄业，不获如愿，只在新德洋行买办秀山叔处供走奔之劳，承教英语。继随宝顺洋人坐帆船赴天津考察商务，在津度岁，大雪漫天，亦亦之衣布锦袍，素位而行，耐苦自励。返沪管丛楼兼管轮船客载事务。公余之暇，月高

① 参见银铠：《中山邑史考》，《中山文史》第37辑；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黄淑娉、龚佩华：《广东世仆制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李权时、李明华主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转引〔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和认同，1853—1937》，第7页。

③ 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刘正纲：《广东会馆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和认同，1853—1937》；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4册）。

要梁君纶卿入英博士傅兰雅先生英华书馆夜课，只读英文两年，可知当日贫读之难。”^①在随后相对漫长的岁月里，郑观应以一位新移民的心态面对“近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主动融入江浙绅商社会，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极大地发挥了自已的作用。^②

再其次，香山人反抗斗争的精神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欲望，也深深地感染了郑观应，甚至直接成为郑观应思想和情感中的一部分。七百多年前，香山乡绅马南宝为了救护逃难中的南宋幼帝而投河自尽。明朝末年，清军进军关内，直抵北京，小榄人李孙宸监守德胜门，以身殉职。康熙年间，香山人对满清政府的内迁政策和出尔反尔的言行，也曾多次奋起反抗，向政府讨还公道。澳门总督亚马勒在澳门不断制造事端，阻挠中国在澳门行使主权，拆迁民房，挖掘祖坟，强迫四周乡村缴纳租税的过激行为，激起了香山人的愤怒，甚至发生了澳门农民沈志亮刺杀亚马勒的事件。^③鸦片战争期间，香山人又积极配合林则徐、关天培的抗英斗争。^④可以说，香山人的忠义爱国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绵延不断，到了近代直接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起源地。香山人反抗强暴、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对郑观应肯定也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尽管郑观应一生当中并不赞成采取过激式的革命方式来获得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但他提出富强救国、追求民主、崇尚科学，同样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意义。

表现之一，郑观应经商之余，对世道人心具有一种传统式的道德关怀。在他早期的《救时揭要》一书中就有着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情怀，谴责鸦片贸易和苦力贩运这种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罪恶事情，主张用中西共通的原则，即国



郑观应故居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第1483页。

②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

③ 黄鸿钊：《澳门同知与近代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参见吴相湘编撰：《孙逸仙先生传》，第一章《生于忧患》，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

际公法等来解决这种极不人道的问题。他说“外国之人万里而来尚能设官来护，何我国如此之不能保护其民乎！优恩各国君主畛域无分，体天地好生之心，遵万国之公法，济弱扶贫，吊民伐罪，集众与西洋国理论之。”^①受父亲乐善好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从未去进行大富大贵的追求，在他的买办事业成功之后，他立刻汇款资助父亲用于建筑郑家大屋和三乡雍陌村的私塾及修路等公益事业，并未将所有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个人消费。^②而且在晚清义赈活动中，郑观应同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也赢得了封疆大臣和绅商学界的好评。郑氏家族乐善好施的品德，就曾受到朝廷的嘉奖。^③

表现之二，郑观应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面前，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在他的《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等著作中，处处流露着他对国家主权的强调和对利权与民生关注。他认为“为使臣者，非才德素著，胆识兼优，持大体而钝气节，达时务而谙西律者，断难胜任而愉快”。指出“嗣后各国使臣宜兼二、三品京卿，其胆识兼优者方膺简命，驻扎外洋”。^④强调：“泰西各有律法，按籍可稽，倘华人理直气壮，援万国公法反复辨争，坚持不挠，彼岁狡狴，亦当无可措辞。”^⑤并主张君民共主，发展工商业，实现富民强国。考其一生的言与行，民本主义思想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可谓至情至性、至深至切而又表里如一。

总之，郑观应由学入商，由商人仕的人生，既是顺应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明智选择，也是香山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香山文化虽然不是郑观应文化属性中的唯一内容，但可以肯定地说，香山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郑观应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倾向和价值观念，并成为郑观应永远挥不去的文化乡愁和历史记忆。香山文化也因有了郑观应这位集先进思想和大胆任事的一代精英而熠熠生辉。

① 《申报》1872年8月28日。

② 易惠莉：《郑观应和他的家族》，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

③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易惠莉：《郑观应评传》。

④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124—125页。

⑤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118页。